昆明学院学报　2018，40（5）：13～17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儿童文学研究】

成长是一场孤独的战争

——《星期三的战争》与《六年级大逃亡》比较阅读

林　洁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星期三的战争》和《六年级大逃亡》诞生于不同的时代与国度，但都是书写年轻生命精神困境的校园小说，两位作家在其中展现了各自的教育理念。作品中的叛逆少年个性相似却拥有迥异的成长道路，这离不开其背后的成长引路人不同引导路径的影响。结合作家童年经验与时代背景来看，西方儿童文学正在强化群体意识，而中国儿童文学则积极倡扬个体意识，两部作品都表现出一定的个体性与群体性。

关键词：星期三的战争；六年级大逃亡；群体意识；个体意识；成长
中图分类号：I1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8）05－0013－05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8.05.003

Growth is a Lonely War：Comparison between *The Wednesday Wars* and *Escape from the Sixth Grade*

LIN Jie
（Humanities College，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Zhejiang，China　321004）

Abstract：Even though finished in different eras and countries，*The Wednesday Wars* and *Escape from the Sixth Grade* are both campus novel about the troubles of young lives. Both of the writers present their educational ideas in the novels. The major teenagers have similar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but totally different fates，which are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guidance from adult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hildhood experience with the time background of the authors，group awareness is strengthened in wester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individual awareness is promoted in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but generally the awareness of individuality and group is found in the two novels.
Key words：The Wednesday Wars；Escape from the Sixth Grade；group consciousness；individual consciousness；growth

成长作为少年小说永远的基调是言之不尽的。有的成长如和风细雨，波澜不兴，伴随着人生的脚步密密作注；有的成长宛若狂风暴雨，大浪淘沙，一番洗礼后春笋拔节；而成长有时也可能是一场布满硝烟、惊心动魄的战争，小说《星期三的战争》和《六年级大逃亡》就给我们呈现了这样的成长。

《星期三的战争》是美国著名作家加里·施密特的作品，它以七年级男生霍林每周三与老师贝克太太的相处时光为线，讲述其在一个学年里的学习与生活经历。本书获得2008年纽伯瑞文学奖。《六年级大逃亡》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鬼才”班马的少年小说代表作，主要书写六年级辍学出逃的男生李小乔对于过去家庭与校园生活的回忆。虽然这两部小说诞生于不同时代与国度，但都是书写年轻生命精神困境的校园小说，两位作家在其中展现了各自教育理念。并且，两部作品的背景都选择了两国历史上较为特殊的时期，但涉及的话题在当下仍具有重要意义，其人物不仅只是个体成长形态的展现，还具有一定的群体特征。本文借助比较研究，分析两位作家笔下个性相似却指归殊致的少年的成长之路，解读成长引路人不同的引导路径，并探究时代背景以及作者的人生经历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成长姿态：被动迎战与主动抗争

这是两个关于叛逆少年的故事，“战争”“逃亡”，从冒着硝烟气息的小说标题即可见一斑。霍林

收稿日期：2018－06－12
作者简介：林洁（1994—），女，浙江温州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和李小乔性格相似，都是鬼灵精怪、富有朝气、内心丰富的男孩。前者七年级，后者六年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规定，青春期的年龄范围为 10 ~ 20 岁，可见两个少年正处于青春前期阶段。青春期是儿童向成人阶段转变的过渡期，个人生理与情感都会发生剧烈变化，宛如化蝶前必经的破茧之痛，他人无法替代。这样的成长仿佛是个人经历的一场战争。

战争（War）在牛津字典中的定义被扩大为："任何存在生命之间的对抗、斗争；一个反对力量或原则的冲突。"[1]根据上述定义，两部小说中的少年霍林和李小乔都在经历自己的战争，不过，他们战斗的主要场域是学校和家庭，对象是学校中的老师、同侪、学长、家中的至亲，以及"旧我"等。在各自的战役中，两人都是孤军奋战，以一人之力对抗周遭多重压力，但是霍林的个人战争是被动之举，李小乔的孤独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主动的选择。

霍林刚进入初中就面临一系列压力：有敌意的老师、嚣张的学长、有隔阂的同学……他总是感叹"做一个七年级的学生真的很难，每天都要面临死亡的威胁。"[2]39他想寻找盟友。然而，在他的"完美之家"里，专制的唯生意不可辜负的父亲、不作为的母亲与只顾追寻自我的姐姐，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站队。父亲还时时拿家族生意胁迫他要表现得尽量完美，不可与"潜在商业伙伴"产生一点儿不愉快。因此，霍林别无他选，只能靠自己一个人在多重压力的夹缝中有限地反击。

从李小乔的回忆中可知，其实在三到五年级期间，有劲的柳老师、思想开放的父母、团结友爱的同学曾给他的生活带来许多快乐。然而到了六年级，体制内的升学压力带来一系列改变：柳老师被调离、父母对于应试的态度变化、同学们的顺从……倔强的本性和对过往的深深眷恋使得李小乔坚持一个人同周围的环境对抗，毅然出走。

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这两位叛逆少年其实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他们的成长是异轨殊途的。虽然两人都在与周围的重重压力对抗，但霍林的抗争表现得比较含蓄。长期在父亲的压制下长大，刚上七年级的时候，霍林的自我意识尚未苏醒。当姐姐跟他说，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时，他还毫无"自我"的概念，因此，起初在面对一系列困境时，他只限于脑海里的抗争，或者偷偷做些小动作、小淘气，他的叛逆是单纯而节制的，不如李小乔那般张扬。后来，他在贝克太太的帮助下，找到了合适的宣泄途径，学会独立思考并勇于反对他人的不合理做法，尤其是对父权的挑战，不过他更多的是采用和解的方式来化解困境，与贝克太太、同学、姐姐和解。相较于霍林，李小乔的反抗表现得直接且激烈。从小在思想开放的民主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李小乔个性张扬，大大咧咧，敢说敢做，虽然有点痞气与油滑，但是"鬼"般精灵，被老师称为"李小鬼"。他认定自己是"吃肉的豹子"不是"温顺的猫"，所以六年级时，在父母采取的强压措施下毫不妥协，倔强地坚持自我，并且还将父母的前后不一、出尔反尔痛斥为"叛变"！虽然一个少年的反抗力量在一群成年人甚至整个社会体制之下是极有限的，但李小乔通过"逃亡"（这已是一个少年所能做的最大抗争）掷地有声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即对当下社会教育体制的猛烈批判。

虽然二者成长姿态有所不同，却并不代表着哪一种更为恰当，我们应当理解童年个体的成长形态具有多样性，被动应战与主动抗争均有各自内在的力量，被动未必消极，主动也未必迎来更好的结果。霍林最初接触莎翁戏剧是出于被动接受的任务，可当他投入朗读时却从中得到了意外的乐趣与收获。通过阅读，他更深刻地理解了世界、人性以及自我，拥有了独立的审视眼光，从而也慢慢从一系列冲突中脱离出来。从一开始的浑浑噩噩到最后对自己人生的清醒认识，从起初想要改变世界到结尾试着先改变自身，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追求：他完成了精神上质的飞跃。而李小乔的成长以在社会上流浪为代价。在社会上闯荡过、见识过人心之险恶，才知道校园环境之单纯，老师虽然有点"烦"，但不会真正"恨"学生。他通过亲身经历，加深了对世界与人的理解。不过，他在心理上仍是矛盾的，他不喜欢校园里的束缚和"工厂式"加工制造的统一规格的学生，但又认识到"一个孩子的命运总是一个学生的命运"[3]。虽然暂时逃离了学校，但他其实是逃不掉的，因此最后只能妥协归来，而妥协的苦涩也是一种成长滋味。

两部小说中的少年最后都选择改变自身以适应世界，不过霍林的独立与自我意识增强并试图从父权话语中脱离，而原本对于自我有清楚认知并勇于捍卫原则的李小乔却无奈妥协于体制，重陷入父权话语的股掌之中。李小乔的战斗对象力量过于强大，结局有种人类在社会上永远无法逃遁的悲剧性的生命况味，给人留下强烈的震慑感。

二、引导路径："沉下来"与"野出去"

刘晓东认为："生物学上的成熟只为儿童精神成长提供可能性，现实的具体的发展则要依赖于一定的外部条件对其精神成长中存在的内部矛盾的转化。"[4]人类基因编码系统的开放性决定了儿童对父母及其他成人和文化环境的依赖性。少年儿童的成长离不开成人的引导与辅助，而不同类型的成长引路人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指导、口头劝告或行为影响等方式带着被引领者踏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在《星期三的战争》和《六年级大逃亡》中各有一位老师在两位少年的生命轨迹中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扮演亦师亦友的角色。他们分别是贝克太太和柳老师。贝克太太最初是霍林的"假想敌"之一，他总以为这个严厉的老师恨他入骨，处处跟他作对，每周三下午的独处时间简直是折磨，然而一学年后与之达成信任和理解，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柳老师则一开始就得到李小乔的拥护，他在班级里采取的一系列教育措施很受小乔的认可，以至于他被调走后李小乔仍念念不忘，即使最后流浪归来仍首先去到学校，想寻找柳老师或者他留下的一点痕迹。李小乔已在潜意识里将柳老师当成自己精神偶像，他的"逃亡"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对柳老师的执着拥护。那这两位老师究竟是有什么样的魔法呢?

《星期三的战争》中的神奇力量来自莎士比亚。自从贝克太太带着霍林共读莎士比亚戏剧，她开始转变为霍林的引路人和其青春战场上的帮助者。莎翁的戏剧给霍林带来太多意外的惊喜与收获。贝克太太说："莎士比亚的作品表达了善良、诚实、正直的力量和持久的爱。"[2]170这些正是面对青春期综合征的霍林所迫切需要的。每周三的亲密接触让贝克太太了解了霍林的生活状况，于是她选择共读的剧本，从十月的《威尼斯商人》到次年五月份的《哈姆莱特》《无事生非》等 8 部，每部都能呼应霍林当月的生活情况。当霍林发现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和他的生活接近，他就宛如进入舞台化身主角，将剧中的人物话语驾轻就熟地活用于人际互动，包括应付霸凌学长、与玛丽莲·李的朦胧爱情、家庭成员间的角力，甚至水波不兴却暗潮汹涌的师生互动，最后也为自己飘动的灵魂找到安定的家。贝克太太的辅助是不动声色的，却给霍林带来巨大力量！在接触莎翁作品之前，霍林的前置阅读作品多是冒险类故事，如《金银岛》《绑架》《野性的呼唤》等，这些书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霍林内心的渴望，即渴望勇敢、强大和遇见未知的冒险，但这些故事只能提供精神上的宣泄与补偿，直到接触莎士比亚作品，文学才走入现实。

其实，加里·施密特的创作目的之一就是想展示莎士比亚文学经典的永恒魅力与现实力量。"希望人们在阅读与演出莎士比亚戏剧过程中，发现其中更深层的意涵，甚至印证到日常生活中。"[5]他认为，只有活学活用，文学经典才能持续散发魅力。作者借小说强调了阅读对于教育的重要意义。书中自有大世界与大智慧，从书本汲取养料并尝试应用于生活，有助于个人更好地认识世界与自我，这也是文学的意义与魅力所在。

贝克太太引导少年"沉下来"，将心理投射到文学世界，借在精神世界中的畅想来得到"力"的释放与宣泄。与之不同的是，班马通过柳老师的形象在《六年级大逃亡》中强调"野出去"的教育理念。

柳老师吸引孩子们的秘诀在于"玩"！他重视"体育"，带着学生尽情游戏，组建了"俯冲"足球队、"花儿"舞蹈团，还在班上开展辩论赛、集体搭建多米诺骨牌、自由设计教室空间等等。这些活动其实都是班马所提倡的"操作性审美教育法"的具体落实。"操作"强调游戏中的身体参与和身体体验，是一种有目的的身体实践，并非一般的玩闹。比如，集体搭多米诺骨牌就是一种既能锻炼创造性思维又能增强班级凝聚力的趣味游戏。方卫平教授认为："儿童文学的游戏不是童年剩余精力的肆意挥霍，而是在自由的游戏中将这精力自然地导向对世界、对自我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把握。"[6]柳老师将"玩"打造成一种快乐学习的方式，班上的孩子们在他的带领下非但没有玩物丧志，反而取得了许多"辉煌成果"，达到小学阶段"巅峰时期"。李小乔极享受这种快乐学习模式，因此对六年级一味追求考试分数的教学方式极反感。

班马的写作实践总是与其理论思考相结合的，方卫平教授这样评价："这种融合的方式很奇特，他的理论思考既在一个很高的思想平台上支撑着他的创作，同时，他的写作又远不只是观念的一种落实，相反，我们会觉得，那些理论恰恰是从这些充满生命感的文字中生长出来的观念物。"[6]班马格外关注童年的"力"的美学。他认为"童年的心

理能量在原始的冲动和社会性的压抑感下追求着释放（发泄），也追求着建构（学习）”[7]，因此需借助一定的渠道让这“力”得到良好的疏导和使用，童年身体的意义应得到充分的开掘与重视。柳老师有目的地带学生尽情游戏就是对于童年身体的充分开发与利用，将童年天性的“力”释放出去，同时引导到新的建构上来，一举两得。

班马的《六年级大逃亡》是儿童文学“野出去”的一次实践，它不仅表现在李小乔对家庭和学校的逃离，还包括将童年的“力”通过身体操作在“撒野”中释放出去，在“撒野”中回归原始活力，以此接通个体童年与群体童年。

三、时代背景：个体性与群体性

通过对《星期三的战争》和《六年级大逃亡》两部作品中主角的成长姿态以及成长引路人引导路径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虽然都是书写少年的抗争，但个体生命的成长形态还是存在诸多差异的，笔者以为，这与两位作家自身生命经验以及时代背景有极大关联。

这两部作品的故事背景、人物经历都与作家个人的童年经验有直接关系，并且他们对于童年经验的运用方式也有相似之处。比如，故事发生地点都设置在自己儿时生活的地方，前者在长岛，后者在上海；校园生活中都有一些事件曾是儿时亲身经历等等。但因二人身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与文化背景中，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表现出的具体童年形态势必存在个体差异。不过，个体总是群体中的个体，结合两部作品的时代背景来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笔下少年的成长不仅仅只是个体命运的书写。

西方儿童文学传统上一向强调个体独特的个性、意志和价值。“但当 20 世纪的生存问题将儿童与种族群体不可避免地缚在一起时，一向强调个体性的西方儿童文学开始在哲学层次上增强了某种群体意识。”[8]235《星期三的战争》以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的越南战争为背景，在主要展现霍林个人成长过程的同时，很好地结合了这一时代背景以及诸多他者的命运。

书中穿插有许多真实的历史叙述，这来自施密特的亲身经验。“他出生于1957 年，在他三岁时越战开打，四岁时嬉皮风始，七岁时（1963 年）约翰·肯尼迪遇刺，十二岁时（1968 年）罗伯特·肯尼迪、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十四岁（1970 年）嬉皮风渐息，十九岁（1975 年）越战终止。”[5]可以说，他的整个童年恰值国内外风云动荡之际，这段特殊经历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年后回忆起来许多细节仍历历在目。

施密特关注战争中的童年群体。他认为“当国家在世界争取地位时，当国内外都发生暴动时，孩子也在试图弄明白奇怪而陌生的国家政策。”[9]但孩子们要怎样参与进来呢？在小说中，中学生和大人们一样密切关注着战争形势与国内政治情况，甚至小镇新闻。即使年龄还小，他们感受到自己也是国家的一份子，童年个体也是与国、与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存在。时时更迭的新闻、老师贝克太太和比吉欧夫人的丈夫们的参战，拉近了少年和战场的距离。霍林不仅在面对自己个人的青春期战争，也在密切关注着动荡的周围世界，并产生过上军校（下一站即战场）的念头。此外，施密特还关注到战争移民，书中写到霍林的一个身份尴尬的同学——越南移民麦琪在美国的生活情况。

尽管这部作品写的是 40 多年前的故事，但就像所有历史小说所作的那样，讲述过去是为了当下，这部小说在 2007 年出版时，世界上的局部战争依然存在。施密特认为，“彼时面临越南战争的霍林与今天一个中学生对伊拉克之战的回应是相似的，这样特殊背景下的少年的成长会有一定的共性”[9]17，他意图给当下战争中的年轻群体一些借鉴，为他们带来积极正面的力量。带着这样的自觉，作品表现出一定的群体意识。

“中国儿童文学一向倡扬群体和谐，人物的‘民族性格’特征明显，不过当‘人的问题’提出后，也增强了个性意识。”《六年级大逃亡》创作于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虽然其中直接涉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容不多，但其创作本身具有突出的新时期文学特征。

班马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步入儿童文学场域，彼时，有一大批优秀作家参与到中国的儿童文学和少年文学活动之中，我国少年文学迅速崛起并鲜明地反映了“文革后”的总体时代特征。“这些优秀作家之所以投入‘少年文学’创作，实在是由于特别地受控于‘少年时代’的精神刺激。‘文革’的卷入青少年，以及这批青少年日后转换成为诉求于青少年读者对象的少年文学作家这一关系，是理解当代少年文学创作心理及其表现的关键所在。”[10]43同时，走过历史焦虑期的我国文学场域开始积极探

索多元化发展，先锋派文学盛行，儿童文学子场域中的班马、梅子涵、张之路、陈丹燕等优秀作家也在积极创作“探索性作品”。“他们力图摆脱传统儿童文学的宏大叙事模式，倡导为儿童写作、与儿童平等对话的创作理念。”[11] 于是，20 世纪 80 年代，少儿文学领域出现了一次集体性的反叛活动，即“‘齐集地’从学校、家庭、社会现实中突围，‘野出去’。”[10]17 班马正是其中坚力量，他的少年幽幻小说和少年写实小说的创作都在积极追求着“野”，《六年级大逃亡》即为后者的典型代表作。

“野”是班马作品美学上的突出特色，“野出去”是班马笔下少年对自身生存方式的一种“齐集性”选择。这种思想始于他在文革中的经验。班马 1951 年出生于上海，1968 年被派去崇明岛农场插队务农，一去八年，一直在田野里劳作。“农业劳动与工业劳动完全不一样，它面对生物，充满生机，在人的身体性的劳动过程中能焕发出一种原生性的生命力。”[10]127 这段经历使班马感受到了生命力的暗语，那时起便确认了对“野”的好感，对自然本性的亲近。

另外，班马是新时期少儿文学作家里最早对学校、家庭题材中可能包含的“不良之物”有所警觉的作家之一。彼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批少儿文学作家几乎齐集性远离学校生活题材，他曾解释：“并非学校生活难以接触，而是有一种内在的感觉，即认识到现行学校教育的趣味中有使他们产生抵触的根本不良之物。所以，他们有意于用作品去抵消当代学校带给孩子们的短浅而危险的东西。”[10]17 许多作家选择书写其他题材来弥补和抵消学校教育可能造成的异化，而班马直击教育现场，并毫不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与批判。李小乔这样的个体是特殊的，包括他的家庭与个性在当代是极少有的，但只有这样充分保留了天性中的原始活力的少年才能做得到为教育体制下众多年轻的重负群体发声之事。在中国儿童文学很多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连的情况下，《六年级大逃亡》出现了不一样的个体反抗声音，表现出强烈的个性意识，实属难得。

对比两部作品，再放眼西方与中国儿童文学传统，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西方儿童文学正在强化群体意识，而中国儿童文学则积极倡扬个体意识。“它们从儿童文学世界的两极面对面走来，虽然方向相反，实际上却是越来越近了。”[8]238

四、结语

青春战场上的霍林和李小乔都是独自在对抗周围的多重压力，在文学经典中找到辅助力量的霍林是幸运的，而李小乔以个人之力反抗体制的战争无疑更具悲剧性。不过，虽然童年个体的成长路径和作者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但其指向是殊途同归的，即少年的成长。在国外作品普遍强调主体性情况下，《星期三的战争》在展现个人成长的同时很好结合了时代背景和与此相关诸多他者的命运，表现出一定的群体意识；当中国儿童文学很多仍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连时，《六年级大逃亡》出现了不一样的个体反抗声音，可见这两部作品在各自文化语境中都有其与众不同之处，拥有独特价值。并且，这两部广受好评的作品对当代儿童文学题材在抗争书写方面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此外，虽然两部作品诞生于不同年代、不同国度，但两位作家关注的话题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李小乔面对的问题在教育改革的今天依然值得重视，而施密特关注的“战争中的儿童”当下仍在持续不断地产生。正因为如此，我们呼吁更多的成人转身为少年儿童积极的成长引路人，让他们在青春战场上不再孤立无援。

［参考文献］

［1］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M］．第 7 版．王玉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263.

［2］加里·施密特．星期三的战争［M］．高雪莲，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

［3］班马．六年级大逃亡［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67.

［4］刘晓东．儿童精神哲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9.

［5］王妍蓁．青春、冲突与阅读力量：论盖瑞·施密特《星期三的战争》［D］．台东：台东大学，2010.

［6］方卫平．我们所不知道的童年更深处——重新解读班马［J］．南方文坛，2013，（5）：105－110.

［7］班马．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M］．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45.

［8］比较儿童文学初探［M］．济南：明天出版社，2009.

［9］KIRKUS. The Wednesday Wars［J］. Kirkus Reviews，2007，75（23）：17－18.

［10］班马．游戏精神与文化基因［M］．兰州：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

［11］金莉莉．当代儿童文学探索性作品的叙事学研究［J］．晋阳学刊，2006（6）：113－116.